

《姊妹们》中的病理书写与宗教批评^{*}

陈 豪

内容提要 本文从乔伊斯《姊妹们》中的“瘫痪”悬疑入手，通过辨析文本中有关梅毒的病理隐喻，揭示爱尔兰民族衰败的宗教原因。作为瘫痪感染源的象征，小说里的无血圣杯牵连出爱尔兰教会的背叛者身份以及罗马与英国的政治合谋。乔伊斯将“活体解剖”的认识论引入小说，并用作宗教批评的武器，既体现出乔伊斯救亡思想的启蒙倾向，也反映了医学作为一种知识话语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强势崛起。

关键词 乔伊斯 《姊妹们》 宗教 梅毒

1904年7月，乔伊斯刚完成《姊妹们》的初稿。在给好友库兰的信里，他谈及此篇小说以及整部《都柏林人》的创作意图“我正为一家报纸撰写一个乞灵系列，共计十篇，已完成其中一篇。这个《都柏林人》的系列将暴露众人眼里一座城市背后的偏瘫或瘫痪的灵魂。”^①而在1902年，英国医学协会举办年会，开展梅毒的专题研讨，首位发言的莫特医生提出“没有梅毒，就没有瘫痪”^②的观点，获得与会者一致认同。他在分析梅毒症状时也用了“偏瘫或某种形式的瘫痪”^③的表述。鉴于乔伊斯的学医经历，两人用语的雷同耐人寻味。

当时爱尔兰的知识分子对“瘫痪”一词应不陌生。它的流行源于爱尔兰历史学家莱基1861年发表的《教士的影响》一文，文中共三次提及“瘫痪”，专门喻指国内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乔伊斯小说的医学主题研究》(15YJC75200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爱尔兰文学思潮的流变研究》(15BWW044)的阶段性成果。

^① James Joyc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7, p. 55.

^② F. W. Mott et al., “A Discussion on Syphilis as a Cause of Insanity”, i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 2181 (1902), p. 1215.

^③ F. W. Mott et al., “A Discussion on Syphilis as a Cause of Insanity”, p. 1216.

宗派纷争和殖民压迫的叠加效应下“民族活力”的衰竭。^① 当时，许多奉行自由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媒体都是莱基观点的传播者。《爱尔兰人联合会报》和《达纳》杂志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刊发过不少讨伐教士政治的文章，那些撰稿人不止一次借用过瘫痪的隐喻。^② 作为忠实读者和供稿人，乔伊斯不可能不了解这些情况。

在《姊妹们》中，当时附属于“瘫痪”的两种话语——医学话语和宗教话语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碰撞。小说开头，男孩凝望神父家的窗户，默念“瘫痪”一词，脑海中闪现“罄折形”和“买卖圣职罪”。他从这些词里觉察出“罪孽的存在”，并欲靠近观望那“致死的成果”。^③ 这些怪异想法让神父的瘫痪显得扑朔迷离。从医学角度看，男孩的内心活动模拟了从病理观察到病因推断的诊疗程序，为即将在叙事中开启的临床视角做了铺垫。作者如此煞费苦心，针对的恐怕不只是神父，更是他所代表的宗教势力。本文将从神父病情的诊断入手，考察医学话语在小说反教权的政治叙事中扮演的角色，并探讨这两种话语结合背后的救亡思想。

一、爱尔兰的“精神梅毒”

如何看待神父病因是解读《姊妹们》乃至《都柏林人》的首要问题。学界就此问题展开过深入探讨，一直争议不断。1974年，美国学者韦斯布兰和沃兹尔在《内科学年鉴》上联合发表论文，他们引入诊断学手段，将弗林的症状与梅毒的临床表现逐条比对，得出弗林的瘫痪是由神经性梅毒引起的结论。^④ 此说在医学上颇具说服力，影响深远。作为主要反对者，《乔伊斯与医学》一书的作者里昂斯确信任何一个在十九世纪爱尔兰长大的天主教徒都很难想象神父会是同性恋或梅毒感染者。^⑤ 但事实胜于雄辩，当时感染梅毒的神职人员有案可查的就有多例。^⑥

^① See William Lecky, *Clerical Influences: An Essay on Irish Sectarianism and English Government*, Dublin: Maunsel & Co., 1911, p. 24, p. 36, p. 48.

^② 有关“瘫痪”一词出现在《爱尔兰人联合会报》与《达纳》中的例证，详见 Douglas Kanter, “Joyce, Irish Paralysis, and Cultural Nationalist Anticlericalism”,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41. 3 (2004), pp. 384–387.

^③ See James Joyce, *Dubliners*, New York: Norton, 2006, p. 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 小说终版出现的昏沉、迟钝、行为怪异、舌头颤抖、手部无力等症状与奥斯勒 1902 年出版的内科学权威著作《医学的原理与实践》一书中对梅毒症状的描述基本相符 (see Burton A. Waisbren and Florence L. Walz, “Paresis and the Priest: James Joyce’s Symbolic Use of Syphilis in ‘The Sisters’”, in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80 [1974], pp. 758–762).

^⑤ See J. B. Lyons, “Animadversions on Paralysis as a Symbol in ‘The Sisters’”,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11. 3 (1974), p. 259.

^⑥ See “General Paralysis and Syphilis”, in *Lancet*, 158 (1901), pp. 460–461.

近年，美国学者蒂敏斯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推测，即弗林与他的两位姊妹都是梅毒患者。作为职业医师，蒂敏斯尽管能给出权威的医学解释，但在人物如何感染的关键问题上却语焉不详。^①事实上，所有持梅毒诊断的研究者基本都无法说清弗林是怎样得病的。另一方面，那些反对者也无法提出一个比梅毒更符合弗林症状的病因。就此，这个问题成为悬案。

平心而论，在韦斯布兰和沃兹尔的论文发表之后，弗林病因的临床研究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诚如福柯指出的那样，医学是一个由“目视”主宰的实证学科，真相获得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对病体投去的那“一瞥”。^②仅凭文字转述，研究者用想象和推理，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自然就偏离了临床研究的出发点。笔者虽然无法通过小说文本确定瘫痪原因，却有充分证据证明以下事实：梅毒不仅出现在乔伊斯的创作构思中，而且还被他确定为小说的隐含主题。1904年8月13日，即《姊妹们》发表当日，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在日记里记下了和他弟弟的聊天“他谈了许多梅毒在欧洲传播的情况，他正在写作一系列有关此病在都柏林情况的研究，他把一切都归因于它。他的话大意是这种病是先天的，不可治愈的，是所有狂躁症病发的起因。”^③《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只字不提梅毒，显然未打算拿它来指涉生理上的疾病，而是要发挥其隐喻功能来暗示别的内容。

桑塔格认为疾病并非隐喻，但同时也指出“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④。作为一种背负着传说的古老疾病，梅毒更是如此。自传入西方那刻起，它就被赋予了种种医学范畴之外的含义。1495年是梅毒在欧洲传播的元年。^⑤由于此病的病理变化相当诡异，加之当时医学知识有限，欧洲人对梅毒的感染原因进行了各种虚构和附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曾在1495年颁布法令称这种“罪恶的麻子”是上帝对人类犯下亵渎罪的惩罚。^⑥之后一百年间，类似的圣灵降罪说甚嚣尘上。可能出于对上帝震怒不可预知的恐惧，有人搬出占星术来解释，甚至还

① See Michael Timins, “‘The Sisters’: Their Disease”,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49.3-4 (2012), pp. 441-454.

② 详见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Stanislaus Joyce, *The Complete Dublin Diary of Stanislaus Joy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1.

④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⑤ 坊间盛行的说法是1493年哥伦布把梅毒从美洲带回了欧洲，可以肯定的是1495年梅毒在那不勒斯爆发是欧洲有史以来对此病最早的记录。当时正值法王查理八世军队征战意大利，由于染病士兵来自欧洲各国，梅毒不久便在整个欧洲迅速扩散。

⑥ See John Parascandola, *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 Westport: Praeger, 2008, p. 3.

不乏医生参与其中^①，但更多的还是拿男性贪色和女性不贞来说事。总之，西方人对梅毒的认知从医学领域扩张到了想象领域，从人类生活的私密领地延伸至社会的公共空间。与其他疾病相比，梅毒承载着许多来自道德、宗教、社会心理甚至美学的评判。当患者身上的疹子被展示在众人面前时，也被贴上了淫乱或失德的标签。在病程发展的第一阶段，患者身上生出脓疮，长满疹子，口腔分泌黏液。强烈的视觉观感把疾病转化为审美对象，并在道德意识的引领下，与堕落画上等号，丑陋的外貌成为邪恶的直观化身。《姊妹们》中，乔伊斯把弗林神父塑造得面目可怖，好像“遭到了天谴”^②，这既符合梅毒三期患者的体貌特征，又将神父同某种罪恶力量挂上了钩。

除了面目丑陋，弗林所表现出的怪癖、倦怠与疯癫的精神状态也属于梅毒三期的典型症候。对照乔伊斯之前塑造过的人物，笔者发现弗林在很多方面都和爱尔兰民族诗人曼根十分相像。首先，两人都是命运多舛之人。伊丽莎评价她兄长“谨小慎微，担负着过多的神父职责，并且一生坎坷波折”（*Dubliners*: 10）。而在1902年的曼根讲稿中，乔伊斯是这样描写曼根的“生活，诺瓦里斯称之为精神疾苦的东西对他来说是沉重的苦行，而他或许已经忘了加之于他作为痛苦的一部分的罪恶。”^③其次，他们都拥有过人天资。弗林儿时生活的爱尔兰镇是利菲河畔的贫民窟，那里的孩子长大后通常是去附近码头当搬运工，而弗林进入尊贵的爱尔兰学院就读，已经证明其天赋异禀。曼根精通数国语言，诗才得到叶芝和乔伊斯的钦慕。在乔伊斯笔下，晚年的曼根骨瘦如柴，脸上像是带着“死亡面具”（see *Critical*: 178），“睁大的双眼呆滞空洞，不常闪烁的目光背后似乎隐藏着回忆幻象时的恐惧和满足”（*Critical*: 179）。这些描写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男孩所梦见的那张神父的丑陋面孔。经过这番比较，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厄运将弗林与曼根这样的人杰摧残到如此不人不鬼的境地？答案就隐藏在曼根讲稿中：

那些文人所坚持的时代和历史的传承，或对现实的否定，都是同一套把戏，可以说把全世界都骗了。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曼根就是他民族的样板。他被历史紧紧裹挟，即便是激情四溢的那刻，也不曾挣脱。在生活和哀伤的诗句中，

^① 例如，德国外科医生古伦派克把梅毒的起源追溯至1484年11月25日土星和木星的相会（see John Parascandola, *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 p. 4）。

^② Eileen Kennedy, “‘Lying Still’: Another Look at ‘The Sisters’”,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12 (1975), p. 362.

^③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9, p. 17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他也大声呐喊，抗议掠夺者的不公，但他的痛惜之情甚至不比丢失方格花呢披肩和饰品要来得深切。他继承了一个传奇最新、最坏的部分，而那个传奇的轮廓还未被勾勒，当继续往下走时，其内部会发生纷争。由于这一传统一直与他相伴，所以他就接受了它，连同所有悲伤和失败，也不知如何去改变。(*Critical*: 81 - 82)

曼根与弗林的个人苦难映照着爱尔兰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爱尔兰同样是早慧之国，曾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中心，乔伊斯骄傲地称之为“圣贤之岛”^①。但它在十九世纪中叶跌入谷底，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映现在乔伊斯对两位人物病态形象的刻画中。由此看来，深究弗林瘫痪之因的真正要义应该是去追问爱尔兰长久以来停滞不前的历史根源。有趣的是，爱尔兰的衰败与梅毒的发病都有较长的潜伏期，而该民族在十九世纪末表现出的时而躁狂、时而怠惰的精神风貌也较为符合神经梅毒晚期患者的行为表现，因而笔者就用“精神梅毒”一词来表征爱尔兰特殊的历史形势，以呼应乔伊斯为实现“祖国精神解放”^②而撰写《都柏林人》的动因。

在《都柏林人》中，瘫痪遍布于各个年龄段，意味着“精神梅毒”具有与梅毒相似的传染性，它在《姊妹们》中的传染途径表现为神父与男孩间的教义辅导。陈旧的和刻板的教学严重束缚了男孩尚未健全的头脑“有时为了取乐，他会故意提些刁钻问题，问我在某些情况下人该做什么，或某某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还是轻微的瑕疵。他的问题使我意识到教会的规章制度是多么复杂难解，而我本来以为那只是些简单的条例。”(*Dubliners*: 6) 用机械记忆代替独立思考，神父授课的重点不是育人，而是谋求对年轻一代的精神控制。难怪男孩在看到告时心里第一反应是“获得自由的兴奋感”(*Dubliners*: 6)，而他所接受的教义辅导其实是爱尔兰当时公共教育的缩影。在乔伊斯接受启蒙教育的克朗伍德学院，死记硬背和教义问答是主要教学手段。在卡伦执掌爱尔兰天主教后，教会和当政的爱尔兰议会党结成联盟，后者允许前者“在各级教育体系中都享有主动权”^③。作为“教皇绝对权威”(*Ultramontane authority*) 的信奉者，卡伦认为学校应该“向年轻人提供有关天主教教义及其实践的完整指导”^④。从时间上推算，

① 1907年，乔伊斯在意大利举办系列讲座，留存下两篇讲稿，一篇以曼根为题，另一篇就是谈他祖国的《爱尔兰，圣贤之岛》。

② James Joyce, *Th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 II,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6, p. 134.

③ Douglas Kanter, "Joyce, Irish Paralysis, and Cultural Nationalist Anticlericalism", p. 390.

④ Paul Cullen, "Letter of Cardinal Cullen to the Catholic Clergy, Secular and Regular, of the Diocese of Dublin", <https://khoa.wordpress.com/2011/05/26/letter-of-cardinal-cullen-to-the-catholic-clergy-secular-and-regular-of-the-diocese-of-dublin/>

弗林就读于罗马的爱尔兰学院期间，卡伦恰好是院长，所以弗林极有可能是其主张的追随者。卡伦垄断教育的企图还反映在他极力向天主教的平民子弟推广基督兄弟会学校上，此举有效削弱了世俗化的国民教育体系。^① 乔伊斯早年曾在一所基督兄弟会学校暂读，这段经历似乎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以至于他在创作中刻意忽略^②。该校坐落于北里奇蒙街，曾在《阿拉比》的开头被提及，作者对其周边环境的描写构成了《都柏林人》里最具标志性的瘫痪景观。

如果说天主教的教育制度禁锢了民众的思想，那么它的忏悔制度则限制了民众的言论。在神经梅毒的晚期，失语症和瘫痪通常相伴而至。《姊妹们》中，人物的突然失语也是普遍症状。许多人在谈及弗林病因而都讳莫如深。从柯特对男孩与弗林交好表达的忧虑来看，弗林的病很可能牵涉某些不便透露的罪恶，他临死前的忏悔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点。根据教规，任何教徒都必须对弗林的罪恶保密，何况这关乎神父履职的合法性。小说里，宗教规约正演化为世俗世界的潜规则，在众人欲言又止的氛围里，旨在助人悔罪的忏悔制度反而为病态社会藏污纳垢创造了环境，当男孩面对这个只讲戒律而难觅真相的社会时，他未免感到困惑。由于教义深入头脑，他没有直接否定忏悔的保密职责，但产生了“不知道谁会有勇气去承担它们”（*Dubliners*: 7）的疑虑。美国学者霍尔帕特的看法揭示了疑虑所指向的危机，认为“教会的这项繁冗的传统造成了弗林的瘫痪，并最终引发爱尔兰民族的精神瘫痪”^③。他的理由在于保密职责是忏悔作为圣礼的基础，但如果对已知罪恶躲躲闪闪，那么净化爱尔兰人的良知便无处入手，民族的精神解放更是一句空谈。教义对言论的规约使教士和信徒陷入信仰和道德的两难困境中，于是走向精神瘫痪也就顺理成章了。从小说人物的集体失语看，民众似乎是真心认同宗教对言论的限制，这就愈加说明爱尔兰人早已病入膏肓，而乔伊斯就亲身经历过普通民众对言论自由的自觉抵触。1899年，主教罗格在未读剧本的情况下，武断判定叶芝新作《伯爵夫人凯瑟琳》为异端邪说。教权拥护者们闻讯后立刻响应，发起抵制剧本的活动。这让乔伊斯相当震惊，他愤慨地说“一个人……如果不讨厌俗众，就不可能热爱真理和良善。”（*Critical*: 69）

① 从1852年到1900年，宗教混合制学校的比例由54%跌至了36%（see Fintan O'Toole, *Enough is Enough: How to Build a New Republic*,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p. 88）。

② 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乔伊斯借老戴德勒斯之口说“让基督兄弟被诅咒吧”，并抹去了这段本应被记录的经历（see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2, p. 53）。

③ A. James Wohlpart, “Laughing in the Confession-Box: Vows of Silence in Joyce’s ‘The Sisters’”,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30.3 (1993), p. 409.

当然，民众效忠天主教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乔伊斯专家托契亚那在弗林的讣告中挖掘出了丰富的历史影射。托契亚那认为，弗林的出生年份与《天主教解放法案》（1829）的颁布极有可能在同一年。^① 该法案出台背后的政治逻辑是英国政府认识到天主教在爱尔兰拥有难以撼动的民众基础，索性顺水推舟，宣布宗教平等，使天主教议员得以进入英国议会，为英国的统治扫除法律障碍。^② 紧接着，大饥荒的爆发又给天主教在爱尔兰的壮大带来了绝佳机遇。1850年至1857年，“虔敬革命”悄然上演，并迅速风靡整个爱尔兰。这是一场由卡伦大主教主导、各教区积极响应的基层布道运动，传教士们的足迹遍及全国所有教区，他们不厌其烦地鼓动当地民众定期出席弥撒及各种圣礼。正是在此期间，天主教释放的“精神梅毒”也随同这场运动得到了大肆传播。弗林的讣告对此事也有所影射：弗林逝世于1895年，恰好是梅努斯学院成立一百周年，而1875年在该学院召开的教会会议是“虔敬革命”最终胜利的标志。^③ 这场运动能大获成功，主要原因有二：劫后余生的人们需要借宗教来抚平内心伤痛，更重要的是，爱尔兰的民族遗产所剩无几——凯尔特文化已成古董，盖尔语也逐步被英语取代，爱尔兰人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已越来越英国化。大饥荒后，爱尔兰人口锐减，整个民族处于危急关口，天主教作为英国入侵前早已普及的信仰给予了爱尔兰人急需的身份认同。对他们内心而言，皈依天主教至少意味着“永远不被英国文化完全同化”^④。

“虔敬革命”后，宗教与民族在爱尔兰人的观念里几乎成为同一件事，导致宗教的功能发生错位。天主教会不再满足于甘当精神世界的引领人，它把对罗马的忠诚注入世俗的民族主义精神中。这看似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实则是让国家背离现代化的富强之路，安于被奴役的现状。据美国学者沃兹尔分析，姊妹俩象征着贫瘠的爱尔兰^⑤，她们不仅要照顾兄长的起居，还要协助教会工作，两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他，结果却落得贫病交加，膝下无子的结局，就如同为固守信仰而错

① See Donald T. Torchiana, *Backgrounds for Joyce's Dubliners*, Winchester: Allen & Unwin, Inc., p. 21.

② 作为对英国的回报，天主教会与奥康内尔领导的联合法案撤销运动并不十分上心，所以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卡西诘问道：“难道不是主教和教士们在1829年为了天主教的解放，出卖了国家的理想吗？”（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p. 28）

③ See Emmet Larki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Irish Catholicism*,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4, pp. 7-8.

④ See Emmet Larkin, “Myths, Revisionism, and the Writing of Irish History”, in *New Hibernia Review*, 2.2 (1998), pp. 68-69.

⑤ See Florence L. Walzl, “Joyce's ‘The Sisters’, A Development”,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50.1-2 (2013), p. 103.

失发展的国家。“姐妹”一词在英语中兼有“修女”之意，暗示了爱尔兰民族身份中难以摆脱的宗教仆役形象。然而，如果宗教造就的只是爱尔兰人迂腐守旧的民族性格，那么男孩从神父瘫痪中觉察到的“买卖圣职罪”又从何说起呢？

二、无血圣杯之谜

据伊利莎交代，神父瘫痪的直接诱因是圣餐礼上圣杯的意外打碎。圣餐礼是天主教最重要的仪式。当然，饮葡萄酒的象征意义实际上与血液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此事最蹊跷的地方在于打碎的圣杯里不见一滴酒，也就是说，神父全程都是拿着空杯子糊弄在场信徒。小说最后的定格画面是死去神父的胸前放着一只“无用的圣杯”，这显然是作者为提示读者注意而做的强调。另一处暗示是弗林死于1895年7月1日，这天是“基督宝血节”，是赞颂基督献身时洒下热血的节日，基督用他的死换来了人类的生。一个神父在这一天死于瘫痪无疑是对圣餐喻义的莫大讽刺。圣杯中盛着基督的鲜血，象征生命的喷泉，是圣礼的核心要素。信徒喝下象征基督鲜血的酒来洗刷罪孽，并通过向全身输送来实现基督附体。鲜血象征着基督济世救人的精神内核，但弗林手中的无血圣杯徒有其表，暴露了教会欺世盗名的本质。小说提及男孩是“玫瑰十字会信徒”（Rosicrucian）（*Dubliners*: 8），在玫瑰十字会的观念里，圣杯象征女性的生殖器。^①在《姊妹们》的终稿问世时，世人早已获悉梅毒螺旋体首先感染生殖器的皮肤，后经血液传遍全身。这让小说得以从传播途径入手发挥梅毒的隐喻功能。血液主要有防御有害物质和输送养分的作用，前者类似于基督鲜血帮助人类赎罪的原理，后者如同在神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如果神父瘫痪指向的是梅毒，那么遭污染的圣杯不仅放不了基督的鲜血，而且还沦为梅毒传染源的象征。

牺牲贞洁来换取肉欲的满足是梅毒的原罪，诚如桑塔格所言，“梅毒起着一种天罚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②。用基督教的伦理评判，梅毒患者的罪状完全可归在“买卖圣职罪”的名下。据《基督教词典》上的定义，“买卖圣职罪”是“一种渎圣罪，通过买卖精神之物来换取世俗的东西。犯罪者将诸如金钱的物质利益等同于诸如圣

^① See Hargrave Jennings, *The Rosicrucians: Their Rites and Mysteries*,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1907, p. 323.

^②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37页。

恩的精神之物，并将属于上帝的东西视为己有”^①。由此可见，该罪名的实质就是拿任何具有神圣性的事物（比如身体）或名义换取世俗报偿（比如欲望的满足）。作为精神梅毒的源头，教会即使在象征意义上也逃不掉买卖圣职的罪名，所以弗林的圣餐礼以失败告终不足为怪。

当然，乔伊斯亮出罪名的依据不止有梅毒的道德隐喻，还有罗马教廷与英国勾结的政治阴谋。教廷以各种清规戒律管束他人，而自身已堕落为世俗权力的贪恋者。既然赎罪券都可以商业化，爱尔兰的忠贞自然会被当作交易筹码。爱尔兰长期居于罗马和英国的治理下，两方势力看似敌对，但谁都不愿看到一个跟上时代步伐、走向启蒙和革命的爱尔兰出现，所以英国和罗马实际上存在着暗中合谋的关系。对此，小说中至少有三处影射：第一，神父住处所在街道的名称就是大不列颠街。第二，民族英雄罗伯特·埃米特以背叛英王罪处决于圣凯瑟琳教堂门廊前，此教堂是都柏林的一个新教教堂，与弗林所在的天主教堂恰巧同名。第三，兄妹三人的教名都是历史上英国君主的名字。其中，光荣革命中落败的詹姆斯二世作为天主教徒得到了爱尔兰国会的支持。波尼一役战败后，国王逃亡法国，抛弃了追随他的爱尔兰子民。不少学者发现，詹姆斯的战败日和神父的死亡日恰好都是7月1日。^② 如此安排无论刻意与否，都暗示英国在殖民爱尔兰过程中对天主教既打压又合作的策略。在《爱尔兰，圣贤之岛》一文中，乔伊斯回顾了梵蒂冈与英国合谋瓜分爱尔兰的历史（see *Critical*: 166）。在他笔下，这一切始于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在1155年委派英王亨利二世征讨爱尔兰的“教皇敕令”（*Laudabiliter*）。此次征讨是彻底的侵略行为，虽然敕令宣称征讨的理由是“向未开化的野蛮人揭示基督教的真理”^③，但实际却是要确立亨利二世为教皇在爱尔兰的权力代理人，以使爱尔兰教会完全听命于教皇个人意志。这种以传播福音为名，伙同一国侵占他国主权，并在得手后分赃权力的勾当，其实质是阿德里安四世拿自己的圣职和教廷权威当背书的政治交易，他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典型的买卖圣职罪。之后，类似的出卖屡见不鲜，但爱尔兰并没有识破背信弃义的罗马，也就错过了民族复兴的时机。

英国的野蛮统治使爱尔兰丧失了改旗易帜的主动性，而罗马用巧妙的伪装掩

^① John A. Hardon, *Catholic Dictionary*, New York: Image Books, 2013, p. 473.

^② See Donald T. Torchiana, *Backgrounds for Joyce's Dubliners*, p. 21; see also Frank Shovlin, *Journey Westward: Joyce, Dubliners and the Literary Revival*,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79.

^③ Qtd. in John Ranelagh, *A Short History of Ire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9.

饰了背叛者的真容。小说中，南妮步履蹒跚，听觉退化，其形象如同在英国的强取豪夺下落后闭塞的爱尔兰。从亨利八世起，英国入侵者就开始频繁迫害天主教徒，这个人口占多数的群体不断失去土地，沦为贱民。十八世纪初，一系列“刑罚法”的颁布对天主教徒政治和财产权的限制更为严苛。姊妹俩在大不列颠街上惨淡经营的小店成了英国治理下爱尔兰民生艰难的象征。本来，政治巨人奥康内尔通过议会斗争已夺回不少权利，但接踵而至的大饥荒彻底把爱尔兰推向瘫痪的深渊，这场由真菌病疫引起的马铃薯危机在英国的袖手旁观下演变为百万人死亡的浩劫。饥荒爆发的头几年里，“英国舆论普遍关注大饥荒对财产造成的威胁，而非对挨饿者的威胁”^①。当时，教皇庇护九世推行改革，需要英国的政治支持。作为交换，他应英国首相罗素的请求在1847年3月左右去信爱尔兰教会，要求他们“维持和平，结束纷争”^②。整个1847年，英国政府与教廷一直都在秘密联络，双方交换意见，以谋求在爱尔兰的治理问题上达成默契。此外，天主教对教徒自我压抑的人格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压力。英国正需要像伊利莎那样一切听从兄长、没有自己主见的民众。在182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爱尔兰某教区主教詹姆斯·道耶尔坦言“我们不会去探究为何那么多家庭宁可在富足包围中活活饿死，也不肯侵犯他人财产权，这是爱尔兰人的性格特质决定的。不！惟有宗教才能培育出这样的牺牲精神，是虔诚的传教者通过卓越的感召和劝诫做到的。”^③大饥荒后，爱尔兰人口急剧下降，教士数量不降反升，天主教的扩张表面上为民族认同争取了再造之机，实际却是英国与罗马合作完成的一场瘫痪接力。乔伊斯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在国家占主导的经济和思想状况下，任何个体意识的发展都不会得到容许。几个世纪无用的争斗和条约泯灭了这个国家的灵魂，教会的影响和劝诫导致个体的自发性陷入瘫痪，而警察、征税机关和守备的武装力量则给身体戴上了镣铐。”（*Critical*: 171）

应当指出，莱基仅用“瘫痪”一词不足以揭示爱尔兰的危机。乔伊斯虽在写作中沿用此词，但得益于新的历史契机，他把瘫痪直接引向梅毒。《姊妹们》的初稿发表后，乔伊斯多次改作品，前后耗时五年。在此期间，医学界对梅毒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1905年5月17日，邵丁和霍夫曼公布梅毒螺旋体的发

① 罗伯特·基《爱尔兰史》，潘兴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89页。

② Saho Matsumoto-Best, *Britain and the Pap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846-1851*,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3, p. 39.

③ Qtd. in Emer Nolan, *Catholic Emancipation: Irish Fiction from Thomas Moore to James Joyc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8.

现，祸害欧洲数百年之久的顽疾终于找到了病因。1907年，德国细菌学家瓦塞耳曼发明梅毒的血液检测法。1909年，乔伊斯后来拒绝服用的法砒凡纳明被发现可以有效治疗梅毒。随着梅毒真相的发现和普及，没什么比它更适合向读者表征十九世纪爱尔兰的苦难史。首先，“没人会诧异出生在十九世纪且足够幸运活下来的爱尔兰人对细菌和传染怀有的正常恐惧”^①。除了传染性，梅毒对生理和心理造成双重影响的病理特点恰好暴露了爱尔兰所深陷的国土与精神的双重殖民。几百年来，英国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如同梅毒长在身上的脓疮一样一目了然，而其副产品——宗教却把背叛和出卖假扮成福音，像输血一样输送给等待拯救的众生。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称梅毒为“伟大的模仿者”^②。当感染发生后，它不急于摧毁宿主，而是伪装成各种疾病的症状，百般折磨患者。以弗林所患的神经梅毒为例，感染后症状一般在五至十五年内爆发，病程持续三至三十年之久。作为英国的秘密同盟，天主教在爱尔兰潜伏的历史差不多也有三十年之久，它始于1847年2月英国驻奥地利大使庞松比与教廷特使在维也纳的密会^③，终于1890年帕内尔倒台。在此期间，宗教活动逐渐渗透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姊妹们》揭露了巧妙的伪装方式。神父死后，男孩与他姑妈登门吊唁，南妮拿出雪利酒和饼干招待他们，圣餐礼就这样通过待客礼仪不经意地完成了。男孩拒绝饼干隐含着他对天主教的反感，但行为表面显现的却是对主人不恭的无礼行为，或者说对客随主便习俗的蔑视。他拒绝天主教也就等于同他所处环境的决裂。宗教通过把自己假扮为风土人情的一部分，获得了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微观权力。

帕内尔的倒台标志着爱尔兰的宗教瘟疫发展到了最后阶段，教会在民族自治即将实现的紧要关口迫不及待地卸下伪装。就像梅毒感染通常始于性，教会对帕内尔的攻击也从一桩性丑闻入手。跟弗林一样，他先是受到道德指控，而后连其他方面的作为也被否定，以帕内尔的政治才干、个人魅力和民众支持度，英国议会的政治对手们光凭绯闻很难扳倒他，但有教会助阵，腹背受敌的帕内尔就无招架之力了。教会的优势在于“募集资金，创办报纸，建立新的政治机器”^④。种种迹象表明它在借宗教之名，行干政之事。作为民族主义者，都柏林大主教沃尔什

^① Martin Bock, "James Joyce and Germ Theory: The Skeleton at the Feast",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45.1 (2007), p. 23.

^② Qtd. in W. F. Bynum,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568.

^③ 在这次密会中，庞松比向教廷特使传达了罗素首相希望梵蒂冈与英国合作一同维护爱尔兰稳定的想法（see Saho Matsumoto-Best, *Britain and the Pap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846-1851*, p. 39）。

^④ Emmet Larkin, *Mounting the Counter-Attack: The Roman Catholic Hierarch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arnellism*,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5.2 (1963), p. 158.

最初确实有观望之意，但在西敏寺大主教曼宁的施压下，不得不改变立场。沃尔什忌惮曼宁，根本上还是因为后者对罗马的影响力。教皇希望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故奉上爱尔兰作为交好礼物。有学者从变体（transubstantion）角度来解读圣杯打碎事件，认为这是上帝针对人们“把变体的伟力归功于魔鬼，而非基督”的降罪。^①对照历史，爱尔兰人在罗马与帕内尔之间选择罗马，犯下了相同性质的罪。同为遭背叛的拯救者，帕内尔与耶稣都是同一种范式的人物。因此，毁坏的圣杯亦可作为前者被出卖的象征。神父在众目睽睽下打碎圣杯，无意中揭穿了圣餐礼的骗局；教会把帕内尔拉下马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图谋，并最终导致“天主教与民族主义在爱尔兰有史以来第一次分道扬镳”^②。如同男孩在神父瘫痪后不得不重新寻找自我，帕内尔的倒台也使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没有信仰的凝聚和领袖的引领，这个国家究竟要靠什么来拯救自己？

三、作为救治之术的“活体解剖”

在《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发表了对现代精神的独到见解，其中“活体解剖”之喻是乔伊斯为瘫痪的爱尔兰开出一贴药剂：

现代精神是一种活体解剖术，活体解剖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具现代性的事物。古代精神只能勉强应付些表象。其方式无非是打着正义的灯笼照亮法律，打着启示的灯笼照亮道德，打着传统的灯笼照亮艺术。但所有这些灯笼都具有共同的魔幻特征：它们变形，然后毁灭。而现代方式则是用白昼之光去照亮自己的领地。^③

《姊妹们》中，代表着“现代精神”的男孩以一己之力抗击沉浸在“古代精神”里的众人。他头脑里的“瘫痪”、“髻折形”和“买卖圣职罪”三个概念涵盖了完整的病理解剖流程。瘫痪是见之于表象的症状，髻折形作为一种残缺的几何图形再现了解剖中病理的空间分布，它又是“医学目视”的对象，为瘫痪的病因判断提供实证依据。男孩首次见到神父尸体时，已提及置于胸前的圣杯，而小说

① See Eileen Kennedy, “‘Lying Still’: Another Look at ‘The Sisters’”, p. 367.

② Emmet Larkin, “The Roman Catholic Hierarchy and the Fall of Parnell”, in *Victorian Studies*, 4.4 (1961), p. 316.

③ James Joyce, *Stephen Hero*, New York: 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Co., 1963, p. 190.

最后再次聚焦尸体，又特别给出圣杯里没有圣血的提示，意味着罄折形残缺的空间表征已通过解剖一览无余。这一幕向读者点出神父失职的同时，也以视觉方式宣告了解剖的完成。

如果说男孩是拥有洞察力的解剖者，那么耳背目昏的姊妹俩则是亟待唤醒的对象。美国学者波恩认为小店橱窗上“修补雨具”（umbrellas recovered）的告示暗喻了宗教的遮蔽性。^① 在神父灵床边，男孩呈现的解剖结果与伊利莎口中的完美尸体大相径庭。沃兹尔教授认为男孩眼里的尸体是对上帝已死的暗示^②，这种解读不免主观，但却反映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男孩的医学目视压倒了宗教言传，展现出启蒙的力量。由此观之，靠这股力量破除宗教对精神的蒙蔽是乔伊斯心中民族救亡的根本。在《爱尔兰，圣贤之岛》的结论部分，他对此作了明确表述“尽管爱尔兰人能说会道，但革命靠的不是动嘴皮子和妥协，爱尔兰已足够推诿和歪曲。如果她想把这出我们已久等的戏码搬上台，那么就让它演得完整、完满、明白些吧。”（*Critical*: 174）

动物活体解剖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盛行与机械唯物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尤其是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论断为人们开展各种动物实验提供了辩护。按照笛卡尔的学说，动物受机械原理操控，没有心灵，不存在感知力和疼痛感。笛卡尔曾亲自解剖过一条活狗，还将手指插入它的心脏切口以感受其跳动，实验过程让他确信动物生命的广延属性^③，并进一步印证了之前的论断。《姊妹们》中，乔伊斯借欧几里得几何学来说明宗教瘫痪的存在，与笛卡尔用几何学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可谓异曲同工。赖斯认为，笛卡尔提供的思路是用“几何学的明晰”来克服“神学话语中的诡辩与晦涩”。^④ 同样地，男孩也是从各种具有广延属性的事物（窗户、圣杯、棺材等）中获得启示，才彻底摆脱了教义的困扰。在心物二元论观念的引导下，剔除任何精神因素，视对象为机器成了解剖者职业素养的体现。乔伊斯继承了这种素养，并在创作中把它转化为冷峻刻薄的叙述文体。以解剖视角观察，爱尔兰的困境可归结为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力的纠缠。从小说中神父的瘫痪，男孩的疑惑，到现实中奥康内尔与帕内尔的功败垂成皆与此有关。

^① See Zack Bowen, "Joyce's Prophylactic Paralysis: Exposure in 'Dubliners'",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 19. 3 (1982), p. 260.

^② See Florence L. Walzl, "Joyce's 'The Sisters', A Development", p. 112.

^③ 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坚持心灵与物质分属两种实体，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广延性是物体的根本属性，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

^④ See Thomas Rice, *Joyce, Chaos and Complex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7, p. 18.

有趣的是，乔伊斯最初对解剖学并无好感，认为这种“无情的科学很危险……会导致人性泯灭”（*Critical*: 28）。实际上，解剖学的原理与他一直坚持的求真艺术观是相符合的，早年他提出好的艺术乃“剥开表面伪装，直达深层规律，且严谨以待”（*Critical*: 40）的观点是对解剖学认识论本质的反映。当然，乔伊斯立场的逆转起因于弟弟乔治死后他做出了学医的决定，并表示“要告别神秘主义而走向科学”^①。随即，他与好友拜访都柏林大学医学院，结识解剖学权威伯明翰教授。伯明翰向他们详细讲解尸体保存的流程，带他们参观解剖室，途中乔伊斯恰巧目睹了一场正在进行的解剖实验。^②对他而言，此次参观既是一堂生动的医学体验课，也是一次难得的美学之旅。习作《显形录》中描写乔治病故的片断就是他首次将解剖知识运用于创作。他故意让人物视角进入患者内脏深处，并在无意间记录下肠穿孔的画面实况。解剖学为专业读者开启了全知视角，他们对真相的掌握，与片断中人物因无知导致的不知所措形成鲜明对比。

乔伊斯对解剖学的艺术移植或许纯粹只是学医过程中获得的灵感，但这样的创造却抓住了启蒙的精髓。十八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兴起在医学史上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启蒙运动的认识论革命，其前因后果与欧洲现代化进程几乎同步。福柯认为现代医学在十八世纪末的诞生得益于临床研究获得的实证属性，“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临》: 4）。“朴素知觉”指医生对病体的检视，即福柯所谓的“医学目视”。目视方式之所以超越疾病分类学，获得诊断上的特权地位，乃是病理解剖奠定的基础。意大利解剖学家莫干尼在1761年写出《疾病之部位与原因的解剖学研究》，这部著作“完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创造，即把患病器官的变化和疾病症状联系起来”^③。换言之，解剖在可感症状与隐蔽病灶间建立了视觉关联，让疾病成为某种可视物。此时，原本依附于疾病的成见和神秘性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源于解剖视角的精确描述。“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19世纪的转折。”（《临》: 5）在给《都柏林人》出版商的信中，乔伊斯将目视的意义与民族进步相提并论“如果阻止爱尔兰人拥有一面能清晰照见自己的镜子，爱尔兰的文明

① Gordon Bowder, *James Joyce: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p. 85.

② 有关乔伊斯当天在医学院的见闻详见 J. B. Lyons, *James Joyce and Medicine*, Dublin: the Dolmen Press, 1973, pp. 26-27.

③ 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程之范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625页。

进程就会延迟。”^① 因为理性被蒙蔽太久，爱尔兰人即使在宗教式微的年代，也习惯听命于信念或偏见，而非亲眼见证。小说中柯特反对宗教干涉教育，但在指控神父一幕中表现出的先入为主的态度与信徒们的盲从并无本质差别。与之相对的是，男孩不偏听偏信，处处留意观察，既发现了神父的具体罪证，又识破了柯特的夸夸其谈。乔伊斯把解剖学运用于创作，其意义正是呼唤这种实证精神回归社会主流意识。此外，他清楚地看到实证精神对文学功能的矫正，他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说“艺术包含情感，也包含用来解剖生活的理性观望。现在，我对后者更感兴趣，我要收集生活真相的碎片，而不是玩浪漫主义那套吹嘘。”^② 此番言论道出了爱尔兰文学的症结所在，从民族抒情主义到文化复兴运动，本土作家们忙于鼓吹民族主义，却少有人拥有正视本国历史和现实的勇气。

康德指出，“启蒙是摆脱人类施于自身的被监护状态”，破除监护的关键不是理智，而是“无人指导下使用它的决心和勇气”。^③ 如果说当初法国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还需要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准备，那么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在现代性思想层出不穷、民族转型如雨后春笋的情况下，爱尔兰的启蒙进程为何依旧举步维艰？从小说里众人的失语表现看，这个民族欠缺的正是康德所说的勇气。在一个不宽容的国家，独立思考的代价是众叛亲离，人们宁可不要真理，也要维护各自阵营的立场。所以男孩几乎被所有人视为异类，柯特和舅舅对他有看法是因为他与神父交往，舅舅称他为“玫瑰十字会信徒”，暗含着对异己者的嘲讽。而到弗林家做客时，男孩拒绝饼干的行为又让伊利莎不满，结果成为两边都不讨好的人。

在这点上，乔伊斯本人就是男孩的原型。不说其他，作为一介文人而非科学家，他公开赞赏活体解剖是需要胆量的。十九世纪末，反动物实验的浪潮在英国及爱尔兰十分高涨。1875年，爱尔兰女作家科博在伦敦成立首个反活体解剖的社会组织，在英国文化圈引起不小的震动，成员中的文学名流就有卡莱尔、拉斯金、勃朗宁和罗塞蒂等人。一年后，政府成立专门的皇家委员会调查动物医学实验，维多利亚女王也向首相迪斯雷利询问立法事宜。^④ 在当时，公开支持活体解剖要冒一定的舆论风险，尤其在文学圈，写评论、小说攻击活体解剖蔚然成风。

^① James Joyc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p. 64.

^② Arthur Power, *Conversations with James Joy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36.

^③ See 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Hyland, ed., *The Enlightenment: A Sourcebook and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54.

^④ See Rod Preece, *Animal Sensibility and Inclusive Justice in the Age of Bernard Shaw*, Vancouver: UBC Press, 2009, p. 118.

当然，科学界的反击也毫不手软，《柳叶刀》、《自然》、《英国医学期刊》等权威期刊多次发文反驳，声称普通公众无权过问科学界的事情。^① 乔伊斯高度评价活体解剖是出于在创作实践中探索真理的迫切愿望，但客观上背离了文学圈的主流立场。冷静地看，维多利亚时代提倡的科技伦理是以英国高度昌明的科学为先决条件的，这种前提在爱尔兰并不存在。因此，向其国民灌输此类道德观无异于宗教之外再添新的精神枷锁。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曾把爱尔兰喻为“实验用的可怜躯体”^②，甚至视其人民为猩猩的同类。可见，反活体解剖运动在爱尔兰还包涵着反殖民的诉求，而对着干的乔伊斯很可能会背上背叛者的骂名。

著名乔伊斯专家廷德尔早就把背叛定为乔伊斯创作的“中心主题”^③，学界对此也已达成共识，但很少有人注意背叛概念在他笔下所呈现的两面性。英语中，“betray”一词除了“背叛”，还有“暴露”之意，这让笔者联想起一个事实：解剖者暴露人体真相，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伤害或贬损，甚至导致人体神圣性的丧失。暴露（背叛）所具有的辩证特点在男孩与神父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再现。神父背叛信仰在先，男孩为暴露真相背叛神父在后。小说中引发疯癫的梅毒和打碎的圣杯都扮演着类似男孩的角色。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生都在书写故乡的乔伊斯会决然地背离家园。乔伊斯曾这样评价爱尔兰的未来“爱尔兰永远失败下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她能复兴，就让她醒来，否则就让她盖住自己的头，永远在坟墓里体面地躺着。”（*Critical*: 174）以上种种表明，启蒙与救亡常常构成悖论。在民族主义泛滥的爱尔兰，真理追求者不仅要对付宗教宿敌，还要提防拿他们当背叛者对待的民族主义势力，启蒙之艰难可想而知。

结 语

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大饥荒在爱尔兰民族记忆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场灾难造成七十多万人丧命，其中很大一部分死亡是霍乱所致。通过书写另一场瘟疫——精神的瘟疫，乔伊斯为宗教批评找到了绝佳突破口。它激起了爱尔兰人对苦难的共鸣，触发他们去追问复兴遥不可及的根源是什么。在乔伊斯学医的

① See Anne DeWitt, *Moral Authority, Men of Science,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2.

② Maureen O'Connor, *The Female and the Species: The Animal in Irish Women's Writing*, Bern: Peter Lang AG, 2010, p. 23.

③ William Tindall, *A Reader's Guide to James Joyc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5.

年代，病理解剖学已成为医学重要的基础科目，其认识论原理就是以视觉的实证形式来追问病因。乔伊斯虽弃医从文，却用他的“艺术柳叶刀”^①剖开了国人精神瘫痪的病根。小说的叙事成了病理解剖学的实验场，在“医学目视”的指引下，瘫痪的症状与病灶通过小说丰富的视觉意象暴露在空间中。它们令人困惑的并置是因为去除遮蔽后不可见的对象忽然出现在目视范围内，改变了原有的视觉布局。但重构的空间配置把瘫痪的表象与中心连接了起来。当现实的表层被扒开后，人们看到了爱尔兰所有问题背后的宗教幽灵和操纵着幽灵的利益同盟。

当然，《姊妹们》的宗教批评不完全依赖乔伊斯一己之力。他利用公众对疾病认知的发展，与他们合作完成了文本意义的构建。作为病理书写的核心，梅毒的艺术内涵在作品接受过程中不断得到扩充和更新。首先，它在医学上赋予精神瘟疫以实存形式。其次，它复杂的症候表现为小说叙述嫁接病理叙述提供了资源保证。更重要的是，罪与罚的心理暗示深深烙印在梅毒的观念史里，引导读者从神父瘫痪入手，一步步完成对天主教历史罪责的追溯。

在《姊妹们》中，病理学被用作批判的武器，这背后是医学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十九世纪的崛起。诞生于十八世纪末的临床医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伴随治疗方式的改变，医院越来越社会化和专业化，这需要“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临》：28）。在此大环境下，基督教的医疗体制不免走向式微。教士地位被职业医生威胁的背后既有现代国家意识崛起的因素，也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而这两步恰恰是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基石。十九世纪末，爱尔兰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重振古老的盖尔文化来拯救垂死的民族。对这场复兴运动，乔伊斯明确持保留态度。医学话语在小说中对宗教流弊的强势出击暗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真正的救治之道在于理性精神的普及，而无关乎老古董的重见天日。

【作者简介】 陈豪，男，1983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英美小说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反恐话语与伊战的本体论批判：〈尸体清洗者〉中的反战书写》（载《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舒荪乐

^① James Joyce, *Ulysses*,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08, p. 6.